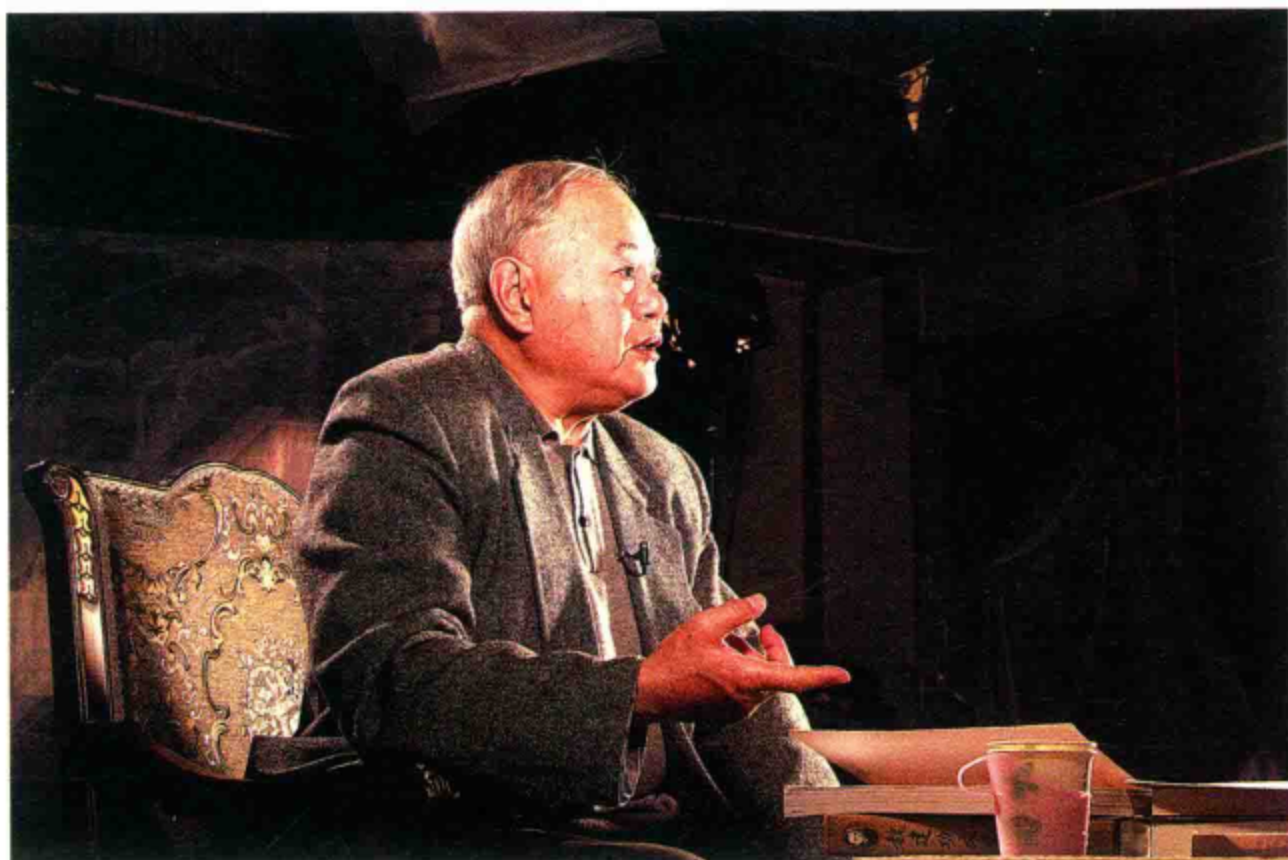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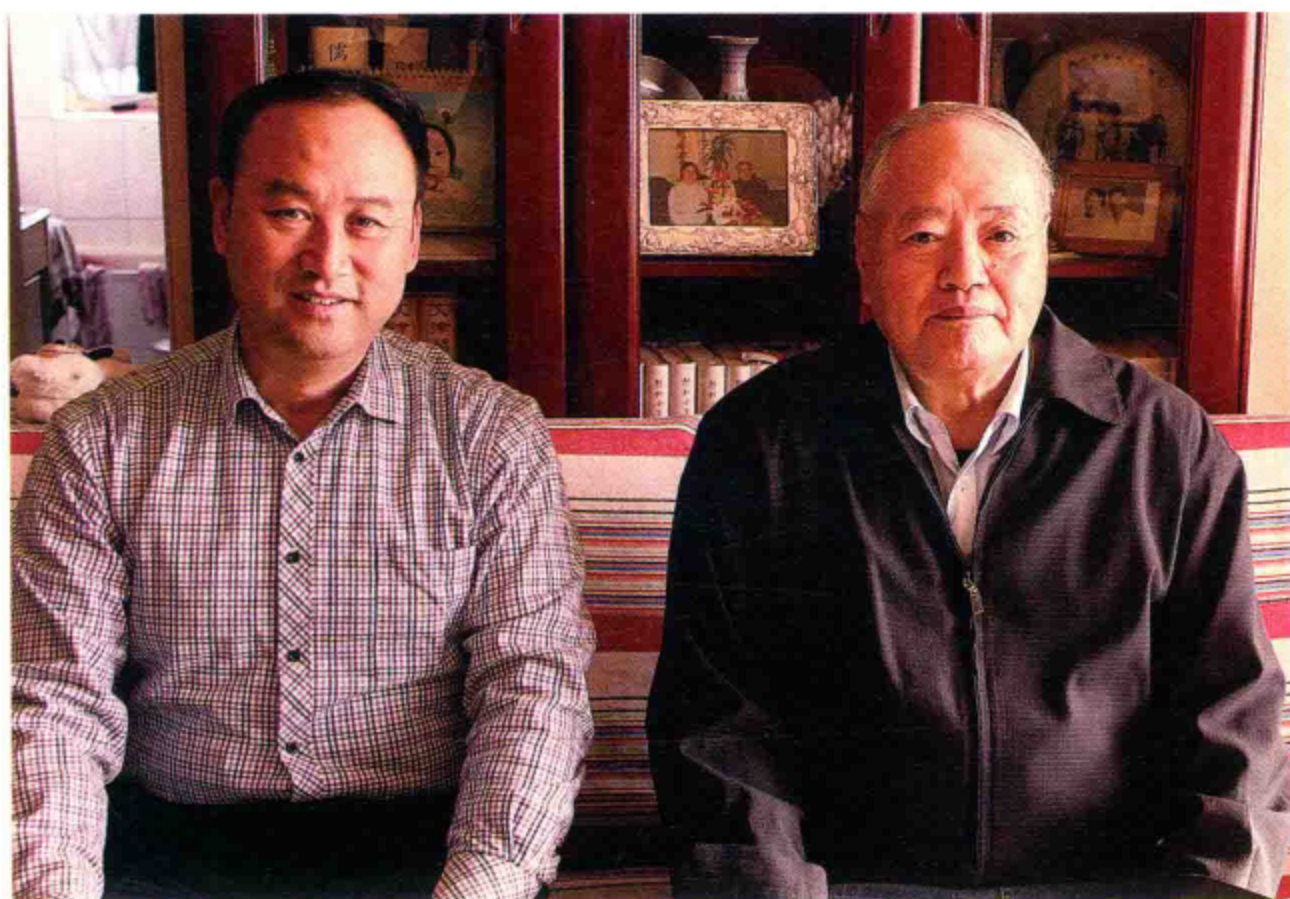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学礼堂师生合影



孙钦善先生



孙先生与王锴合影



孙先生八十寿诞时弟子献花



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（修订本）



《论语本解》（修订版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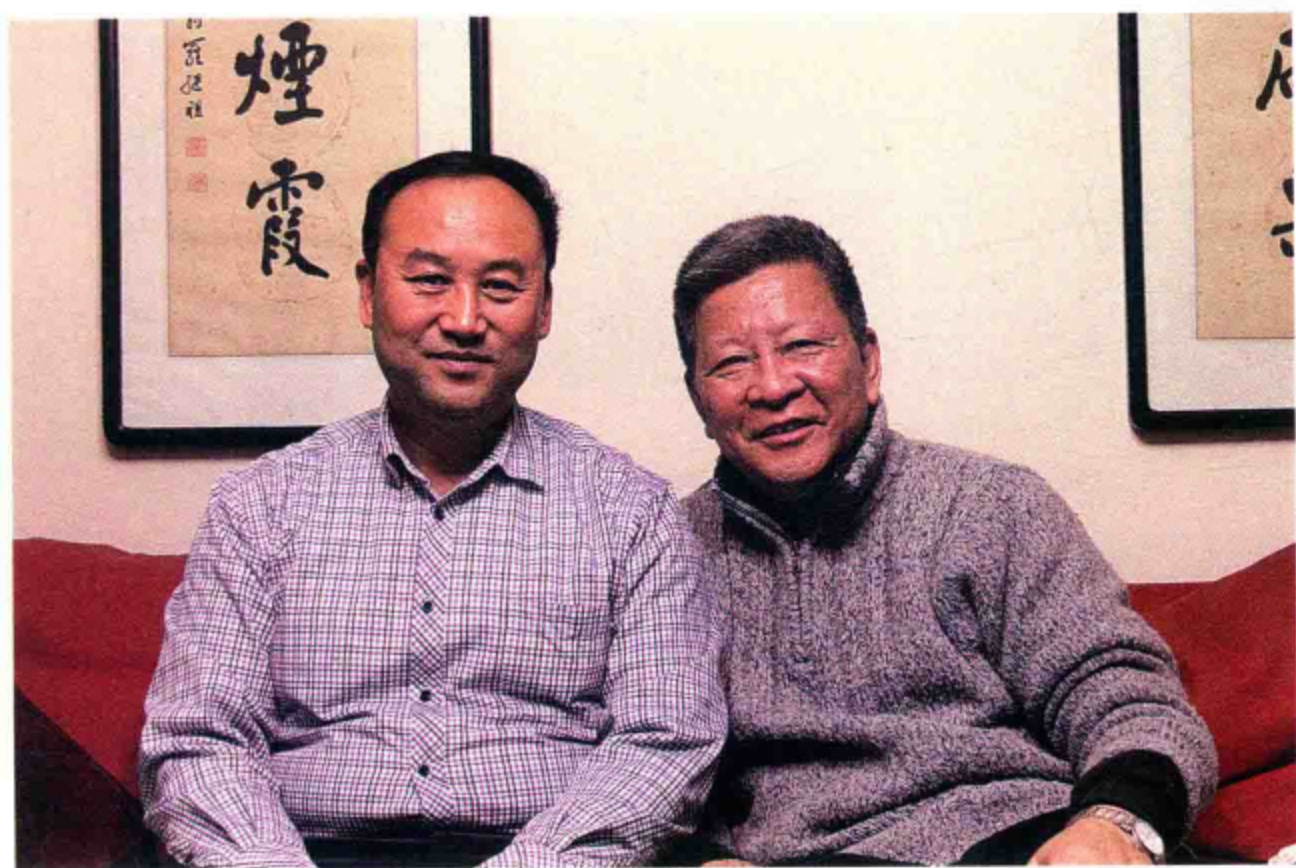
《清代考据学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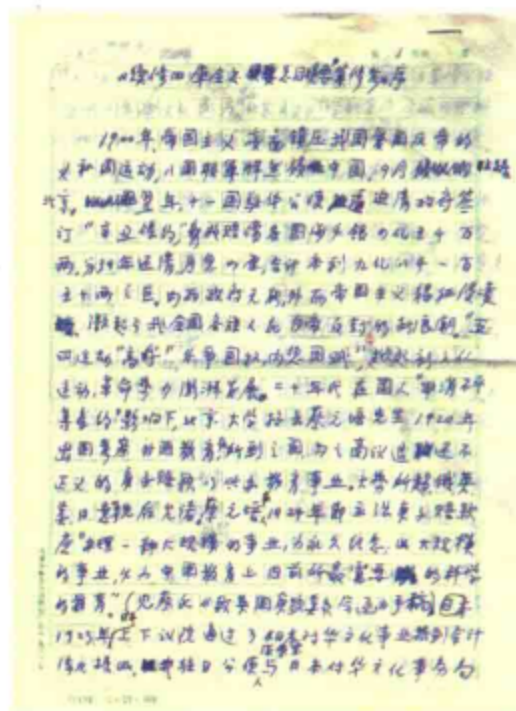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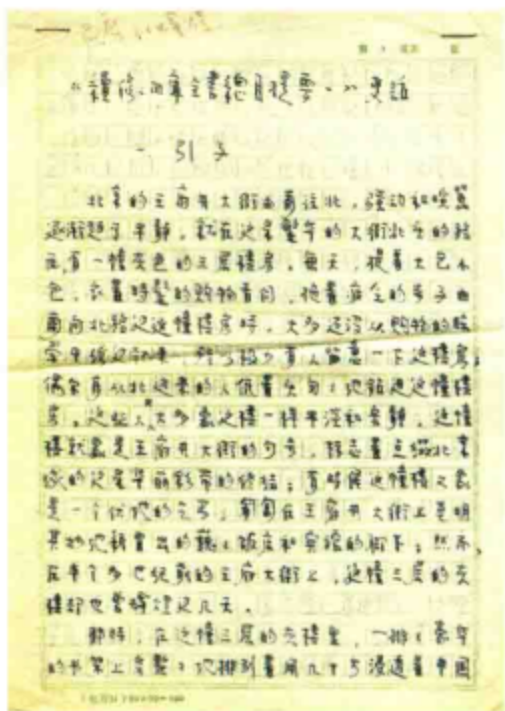
《高适集校注》（修订本）



罗琳先生



罗先生与王锬合影



1989年4月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话·引子》底稿

1994年傅振伦先生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考·序》手稿



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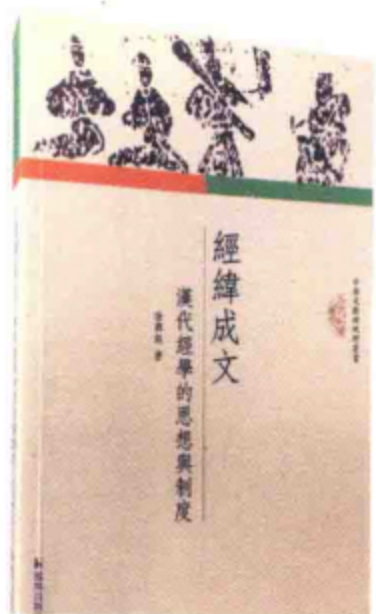
部分“四库学”著作



徐兴无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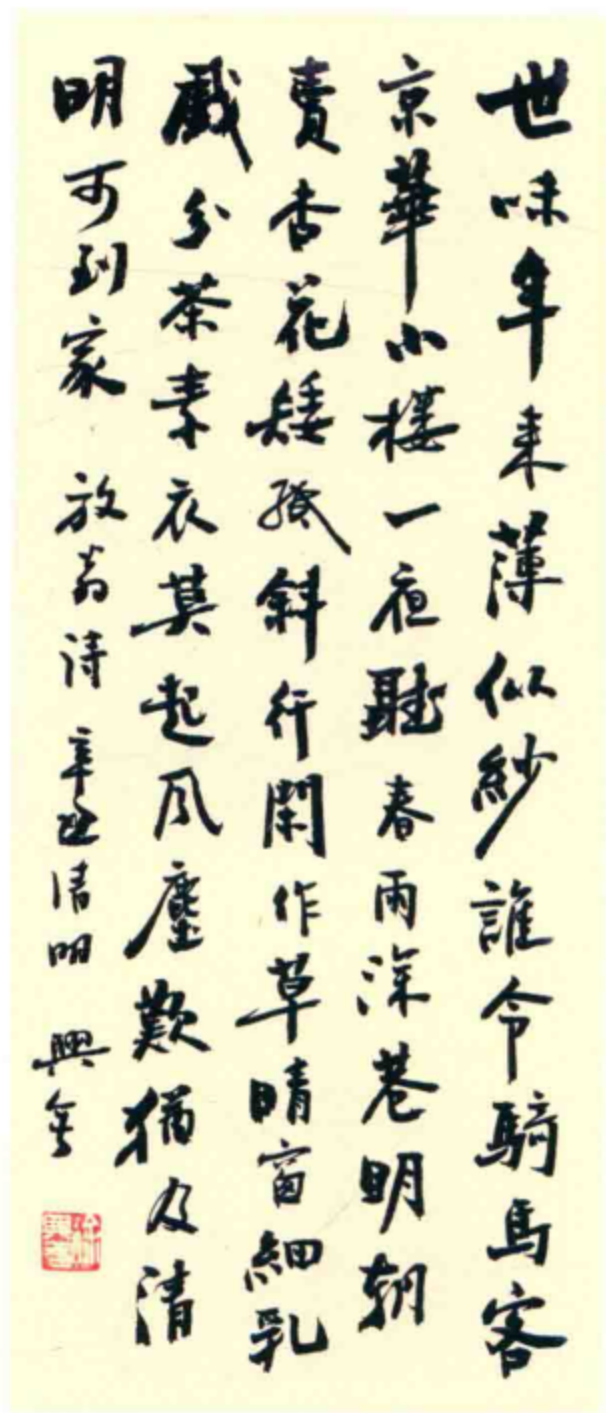
徐先生在学礼堂接受王镔采访



《经纬成文：
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》



《识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》



徐先生书法作品



徐先生临《史晨碑》

序

王锸

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其赖以传承有序、绵延不绝者，是有汗牛充栋文献之缘故。西汉改秦之弊，大收篇籍，开献书之路，置写书之官，建藏书之策，充秘府之藏，兰台石室，插架渐备。汉成帝时，刘向、刘歆父子整理图书，编《别录》，奏《七略》，班固“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”，著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分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六略，著录图书。唐代贞观年间，修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五部，命颜师古、孔颖达等人撰《五代史志》30卷，其中有《经籍志》4卷，即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收录唐初所见典籍。文献又名艺文、坟典、图书，或曰经籍、典籍、书籍，故正史中，或云“艺文志”，或曰“经籍志”。艺文经籍之作用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总序曰：

夫经籍也者，机神之妙旨，圣哲之能事，所以经天地，纬阴阳，正纪纲，弘道德，显仁足以利物，藏用足以独善，学之者将殖焉，不学者将落焉。大业崇之，则成钦明之德；匹夫克

念，则有王公之重。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，流显号，美教化，移风俗，何莫由乎斯道？故曰：“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遭时制宜，质文迭用，应之以通变，通变之以中庸，中庸则可久，通变则可大，其教有适，其用无穷，实仁义之陶钧，诚道德之橐籥也，其为用大矣，随时之义深矣，言无得而称焉。故曰：“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”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以知今，其斯之谓也。是以大道方行，俯龟象而设卦，后圣有作，仰鸟迹以成文，书契已传，绳木弃而不用，史官既立，经籍于是兴焉。……夫仁义礼智，所以治国也，方技数术，所以治身也；诸子为经籍之鼓吹，文章乃政化之黼黻，皆为治之具也。（唐魏徵等《隋书》，第4册第1023—1029页，中华书局2019年1月）

经籍之中，蕴含精微玄妙之旨意，圣贤哲人之能事，通达天地，经纬阴阳，端正纲纪，弘扬道德，彰显仁德利于万物生长，潜藏功用可以独善其身，学习文献者日益进步，不学典籍者落后退步。建功立业者重视经籍，可以成就美好德行，普通百姓专心读书，即可获取王公之位。帝王之所以树立声望、流传尊号、重视教化、移风易俗者，哪位不是从图书教化入手的？所以，《礼记·经解》说：“为人温柔敦厚，是《诗经》教化的结果；通晓远古，是《尚书》教化的结果；心胸广阔，是《乐经》教化的结果；清静精微，是《周易》教化的结果；端庄恭敬，是《礼经》教化的结果；为文叙事，是《春秋》教化的结果。”因时制宜，文质互用，适时变通，符合

中庸之道，既可持久，亦能光大。六经之教适当，作用无穷，就像是包含仁义之转轮、重视道德之风箱，功用巨大，与时俱进，其义深刻，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。所以说：“不快而迅速，不行而到达。”今天之所以知晓古代、后代又能了解当代，都是文献的功用。大道通行之时，俯察龟背而画八卦，仰观鸟迹制造文字，文字流传，结绳记事弃置不用，设立史官，经籍艺文之用兴盛。……仁义礼智，是治国之本，方技数术，是立身之本，诸子鼓吹经籍，文章修饰政教，皆为治国之方略。

文献之作用，至大且巨，“学之者将殖焉，不学者将落焉”。儒家重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乐经》《周易》《礼经》《春秋》六经之教，小则修身，大可安邦，然学习六经不得其法，拘泥死板，则适得其反，故《经解》说“《诗》之失，愚；《书》之失，诬；《乐》之失，奢；《易》之失，贼；《礼》之失，烦；《春秋》之失，乱”。如果对六经深刻钻研、活学活用者，则受益无穷。《经解》说：“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《诗》者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于《书》者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《乐》者也；洁静精微而不贼，则深于《易》者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于《礼》者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

六经如此，四部文献无不如此，这几乎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学者的共同认识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前三篇是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，郭晋稀先生《白话文心雕龙》说：

圣人的思想，既与造物者的道心一致，又和神理相通。圣人所著的经书，文章形式既合于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美，内容也

发扬了道心神理创造美的用心，所以圣人既与神、道合德，圣文自然是反映了天地万物之美的伟大经书。圣人与大道同心，与神明同德。

道心和神理既创造了万物，同时又赋予它以美的属性，而道与神的这种功能，又只有圣人才能理解，所以圣人所写的经书，《宗经》说：“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参物序，制人纪，洞性灵之奥区，极文章之骨髓者也。”换句话说，就是六经与天地合德，与造物同心。

《原道》说：人“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”。但这个人，是指的整个人类，不是指的圣人，一切作家所写的诗文，也不是六经，所以一切作者都要“征圣”“宗经”，只有“征圣”“宗经”，才能向着道心与神理迈进。

由于刘勰认为文学艺术之美，本源于道心与神理，所以以《原道》为第一篇，又说“本乎道”（《序志》）。由于这个道心和神理，只有圣人才完全明白，后人必须向圣人学习，所以将《征圣》列为第二篇，又说“师乎圣”（《序志》）。更由于只有圣人的经书才发扬了道心和神理，所以将《宗经》列为第三篇，因为“文能宗经，则体有六义”（《宗经》），又说“体乎经”（《序志》）。

原道、征圣、宗经是三桩事，刘勰认为三者却熔为一炉，三位本来是一体，不可分割。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。没有道，就无所谓圣人与经书；有了道而没有圣人，道就永远是个混沌，是个谜；有了道，又有了圣人，如果圣人不依据道

心和神理，著为经书，则后人没有探索道的桥梁，神之奥秘，道之本质，美的根源，就不能揭示出来，不能为后人所理解。所以刘勰作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是把文学作为哲学范畴内的认识论看待的；他还要在纬候中去伪存真，又告诉人《离骚》也包藏经义，同时他又认为屈原“虽非明哲，可谓妙才”，然而究竟不是圣人，所以说“变乎骚”。然后他总结说，以此五者为“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”（《序志》）。（郭晋稀译注《白话文心雕龙》前言第18—19页，岳麓书社1997年）

圣人撰写经书的目的是为了明道，“六经与天地合德，与万物同心”，因此，所有著书立说者，都应该“原道”“征圣”“宗经”，外加“正纬”“变骚”，实乃为文之关键。所以说，作文能否传之久远，文献经籍能否传承，与其是否“原道”“宗经”关系密切。

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是文化的载体，文人学者是文献的创造者和弘扬者。文人著书立说，惟有“宗经”“征圣”，才能“原道”。没有学者的创造，就不会有文献；没有文人对经典文献注释训诂、收藏校勘和阐释刊刻，文献就无法流布传播，中华文明也就无法延续并推陈出新。

《学礼堂访谈录》第六辑《皇皇者华》收录对孙钦善先生、罗琳先生和徐兴无先生的访谈。他们既是中国古典文献的传承者，也是中华文化的弘扬者。

孙钦善先生于1955年9月由山东省立青岛一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，1960年7月本科毕业，攻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。1963年3月研究生毕业，留本系任教。现为北京大学

教授、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。曾兼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、古文献研究所所长。先后应邀赴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和美国、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和演讲。2002年退休，2004年被学校返聘，参加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研究中心工作，任《儒藏》总编纂（四人之一）及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、古代思想文化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高适集校注》《龚自珍诗文选》《论语注译》《论语本解》《论语新注》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《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》《中国古文献学》《中国古文献学文选》《清代考据学》《全宋诗》（合作主编）、《儒藏》（合作总编纂）等。

我认识孙先生快三十年了，其为人也，温雅敦厚，奖掖后进；其为学也，立足文献，实事求是。孙先生的学术成就，主要体现在《论语》研究、高适与龚自珍诗文研究、古文献学研究和参与《全宋诗》编纂、主持《儒藏》等方面，《论语本解》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《中国古文献学》等著作，享誉学界。先生高足漆永祥兄的《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学行述略》总结其学术说：

清代学者阮元在给乾嘉时期的学界大师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撰序时，称钱氏之学为他人所不能者有“九难”，依次为道德、性理、经术、史学、天算、地理、文字音韵、金石、诗文等方面。今吾师承继乾嘉，借鉴西学，守先待后，开新造大，继美前修，轨范来学。永祥以为在今日学界，吾师为他人所难能者，亦有九焉。现自揣冒昧，兢兢述之如下：

吾师生长东鲁，承阙里遗范，儒风早沐，夙惠天成；又复

负笈京师，肆业国学，从游师长，皆宗匠宿儒，故学养深植，骏德充沛。魁伟弘毅，敦厚温雅。阮元所谓“人伦师表，履蹈粹然”者，吾师备焉。此人所难能者一也。

吾师之学，上承清儒，下启后昆。以小学为根柢，义理为终极。考证必求其据，义理必探其本。实事求是，不务奇炫。以经解经，以孔释孔。音声训诂，求本溯源；知人论世，返其本初。孔门微言，诸经大义。经术性理，一以贯之。此人所难能者二也。

近人诗古文学，论说释解，流于赏鉴；疑义剖辨，日趋晦涩。吾师早年，即参与《中国文学史》《近代诗选》《关汉卿戏剧集》之编纂。故集部坟典，凡诗文别集，小说戏曲，皆泛览博涉，比堪异同。宪章文物，烂然于心。先生之阐释高适、龚自珍诗文，不为迂曲凿空之论，务为典丽平实之语。校注赏析，熔为一炉。言简意约，深得风人之旨。而校本选注，风行海内。此人所难能者三也。

近代以降，诗分唐宋。而尊唐卑宋，流俗毋论，通人类然。究其缘由，则康熙时所纂《全唐诗》，为学界所谙熟；而宋诗传本，或深锁馆阁，或散佚民间，辑校无由，获睹为难。吾师主持编纂《全宋诗》，书海兀兀，穷年矻矻。荒野拾骨，断崖觅碑。细大不捐，终成全诗。唐宋诗歌，双璧相埒。煌煌巨编，千载不灭。此人所难能者四也。

吾师之治古文献学，纵横千年，参稽四部。古典非旧，朴学时新。以史为经，以人为纬。山林隐逸，钩沉抉隐；累代文献，汇萃都凡。纠谬正讹，别辨精审。拓塞辟藁，创获寔多。筌路

蓝缕，承前启后。开新造大，自成体系。此人所难能者五也。

明季曹学佺，清代周永年，皆倡言编纂儒藏，而时暗世乱，终付空山。今太平之世，祥瑞之年，国学设馆，纂修《儒藏》。吾师为总编纂之一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谨慎戒惧，知难而进。既总其事，又兼点勘。丹黄涂乙，拾遗补阙。典型既立，拟者可操。此人所难能者六也。

吾师治学，远宗汉儒，重其师承，明其源流。而复会通古今，触类旁通；借鉴西学，为我所御。治学授课，遵循教学与科研结合，博涉与专精结合，古文献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结合，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比勘结合，理论与实践结合，继承与开创结合，考据与义理结合。是渡海之梯航，诚不二之法门。故教学相长，著述等身。此人所难能者七也。

吾师自入国学，即从事古典文献之整理与研究，五十年间，荣辱与共。壹力专心，倾情奉献。培根护叶，终至繁盛。弟子后昆，遍布宇内。植之以学，蕙之以德。师友兼爱，同好称是。经师人师，谐美兼备。此人所难能者八也。

吾师八十上寿，体健魄壮，行敏履绥。学术青春，再焕新彩。笔耕不辍，期颐可待。师母景福，相敬如宾。子孝亲和，一门渊睦。此人所难能者九也。

（漆永祥、王岚主编《刊落浮词求真解——孙钦善先生八十上寿纪念文集》第45—47页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12月）

诚哉斯言！可谓实录！

罗琳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）研究馆员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图书馆学会“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”委员，文化部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。主要从事古文献整理与保护工作，整理出版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经部）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稿本）；曾任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目室主任、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编目部主任、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主编、《四库提要著录丛书》总策划及执行主编、《四库全书底本丛书》主编，遴选目录，征访文献，鉴定版本，筹划影印。主持“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古籍目录网络数据库”及“中国科学院古籍联合数据库”和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之“（汉文）古籍普查登记平台”研发工作。先后荣获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”。

罗先生为人豪爽，极重义气。2019年12月初，我去北京燕山出版社、北京服装学院、清华大学进行学术交流。刘蔷女史专门组建“12·7日欢迎王锸兄到访清华园”微信群，邀约罗琳、漆永祥、刘石、夏艳等先生于12月7日晚在“牛麒麟潮汕牛肉火锅”（双清路店）聚餐。席间罗先生说，当日有大学同学突然来京，不能不见，故于傍晚先赶到城东看望同学，饮水一杯，握手别过，便从城东驱车50公里至城西双清路参加聚餐。记得他进包厢时，气喘吁吁，仍不忘答应漆兄之物，胳膊肘夹雪碧一瓶，供其陪酒。友朋聚会，我与罗、刘（石）二位猜拳饮酒：哥俩好啊，五魁首啊，八大仙啊，十满堂啊……他人或斟酒，或观战，或拍照，兴尽而归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